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2

2007年1月16日

最大的社會不和諧：勞資關係 —— 兼評私權、市場和公共服務的局限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中共 16 屆六中全會《決定》要求通過“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發展和諧勞動關係”，並在促進就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公共管理和健全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制度等多角度上，對實現這一重大社會和諧的戰略任務提供了多角度的政策性支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中央全會的《決定》中，這是一個空前的新現象，凝聚了多年來中央對於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的極大關注，以及在這方面積累的各種經驗。這個《決定》的諸多內容，本身也是對於市場原教旨主義“改革”的拒絕。

因為，這畢竟是涉及中國總數約為 7.2 億的普通勞動者現在與未來的生活狀況，特別是這個極其巨大的勞動階層與約四千多萬個大大小小雇主的關係的問題。應該說，“發展和諧勞動關係”，是完善基

本經濟制度、協調社會各階層關係的戰略支點，是建立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最廣泛、最堅實的戰略基礎，是國家社會政策的重點，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大戰略任務。任何離開了這種理性的政策選擇，而又說要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的議論都是舍本求末的奢談。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經驗表明，在市場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歷程中，無論是以私有制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無論是在私有制部門還是在公有制部門，一方面形成了勞動力市場，另外一方面卻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要改善和提高雇員的勞動權益保障水平，要在總體上改進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無從想像的。

在發展的轉軌國家中，所謂依靠資本“自發提高”雇員的收入和僅依靠二、三次分配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是缺乏實質性作用的。大國印度的醫療制度比較有利於窮人，教育制度也有善可陳，但是貧富分化嚴重。一些拉美國家也是實例。

在發達的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中，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傳播和全球化的進展，雖然“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機制仍然在作用，已經遭到威脅和侵蝕的“福利國家制度”仍然存在，但是，在初次分配領域中，資本勢力猛增，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受到衝擊的既成事實，已經成為社會分化、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加速器。在歐、美、日和臺灣地區，貧富分化中已經出現了以雇員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土崩瓦解”的現象，——所謂資本社會最重要的“社會穩定器”已然噤若寒蟬，出現了嚴重的故障，前景堪憂。西方主流、非主流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已經受到實踐的嚴重質疑。理論和政策需要創新。在這種十分明朗的局面下，中國對各種打扮的“洋教條”要有所警惕，不要盲目地“邯鄲學步”，自廢武功。

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短短 20 多年中，勞資關係協調機制也僅僅處於“初步形成”的水平，並不完備，以致當前“勞

動關係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分配秩序不規範的矛盾日益尖銳”，“勞動爭議繼續呈大幅度上升趨勢，勞動爭議預防和處理工作仍將面臨相當大的壓力”，¹——這既是公共治理存在缺失和公民社會缺乏自我調整機制的表現，也是多年來收入分配和相關社會問題日漸尖銳化，勞資兩大階層的矛盾日漸增多、增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勞資關係涉及總數 7.6 億的普通勞動者和雇主，這個巨大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和諧。中央提出“發展和諧勞動關係”是有針對性的重大政策，不是憑空提出來的宣傳口號。

目前，從我國就業結構的角度看，在積極擴大就業的同時，“發展和諧勞動關係”和改進初次分配中的相關制度，要以非國有部門為重點（國有部門的問題也不能忽視）。要制定完備的方案和日程表，著力完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

同時，也要認真梳理圍繞這個問題（包括與其一體化的分配制度）而提出的各種理論觀點。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直面私權、市場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不要過分誇大公共服務的作用，要探索辯證施治之道，直奔建設和諧社會的主題。

一、就業結構及走勢：非國有單位為主，底線在哪？

非國有單位已經成為就業的主渠道。2005 年已經有 3.8 億人在非國有法人單位（包括鄉鎮企業、鄉村私營企業）和城鎮個體經濟中就業。未來幾年中，非國有單位的就業人員有可能進一步大幅增加。下面是幾組有關數據：

就非農產業而言，非國有單位已經是就業和新增就業的主體部

¹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2010 年）〉，《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9 日。

門。國有單位的就業人數不斷萎縮。2005 年城鎮單位和個體就業人員為 27331 萬。其中，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為 6488 萬人，佔比為 23.7%。如果減去國有單位就業人員中的公務員約 600 萬人和事業單位約 2900 萬人，其中的國有產業單位職工約為 2988 萬人。

1996~2005 年，國有單位就業人員減少了 4756 萬人，十年中年均減少 475.6 萬人。相反，同期非國有單位的就業人員增加了 12165 萬人，十年中年均增加 1216.5 萬人。²

這一減一增的趨勢還在發展。據國資委的計劃信息，2005~2008 年，僅政策性破產就涉及 2167 戶企業和職工 366 萬人；另外，全國還有二百多萬職工擬通過“主輔分離”政策進行分流安置；這兩部分人共計 566 萬以上。³ 之後，國企的市場化破產將全面展開。另外，在“十一五”期間，國資將加快向重要領域、優勢領域、中央企業等方向集中的速度。⁴ 國企的產權改革也將繼續推進。在這些舉措下產生的失業人員和部分職工進入非國有企業就業的現象，都將進一步增加非國有部門的就業人員。

另外，事業單位改革也將全面展開，2900 萬人中會有一部分人因為“國資將逐步退出公立醫院”⁵ 等各類公益性單位和“減員增效”等各式各樣的“改革”，失去現在國有單位的身份或崗位。如果要滿足國家發改委某官員關於“應從總體上收縮事業單位

²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 年 9 月。其中，公務員人數來自有關政府部門訪談，事業單位職工數來自中編辦副主任王瀾明：〈事業單位改革的歷史與現狀〉，求是雜誌社《紅旗文稿》2006 年 15 期。

³ 〈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國企改革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新華社北京 2006 年 11 月 9 日電。

⁴ 〈搞好國有企業，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人民日報》2006 年 3 月 13 日。

⁵ 2004 年 7 月 27 日《中華工商時報》報道：〈國資將退出公立醫院〉。2006 年 8 月，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又出售一家年盈利 1600 萬的大型公立醫院，並允許業主將這家醫院改為“贏利性單位”。2006 年 8 月 14 日《市場報》報道：〈杭州口腔醫院改制莫名其妙，國有資產可能被低估〉。

的規模”的個人“建議”，⁶ 估計起碼減少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員才能體現“總體上收縮”的“改革目標”。

現在，按 2010 年“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一半”的“中庸之道”進行估計。首先，假定國企從競爭性行業“全部退出”要減少約 1494 萬人（其他剩餘的 1494 萬人視為在國有壟斷企業上班），⁷ 退出“一半”則將減少約 747 萬人。事業單位作同樣的處理，從那種設計要減少的約 1000 萬人中削減一半，祇減少約 500 萬人，保留 2400 萬人。這種情況下，2010 年全部國有單位的就業人員總數減少約 1247 萬人，保留約 5241 萬人。

但是，僅僅從國資委計劃在 2005~2008 年間，國企的政策性破產和“主輔分離”就要減少 566 萬人的角度看，到 2010 年底國企因其它改革措施僅再減少 181 萬人，兩者相加從而達到總共減少 747 萬人的目標，這種“中庸”的估計肯定是太樂觀了。比較實際的估計是，2010 年底全部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就業人員總數，因各種各樣的改革，將保留在 4000~5000 萬之間。

無論哪種估計，未來五年中都可能逐步從國有單位分流出來上千萬企、事業單位人員。假定他們都能夠就業，那新就業崗位祇能是非國有單位（包括改制後的國有單位），多數又將是非公有制單位。非

⁶ 2005 年 2 月 24 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朱國棟在〈我國事業單位改革提速，職工將告別國家幹部身份〉中報道，“2004 年下半年，國務院已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事業單位下一步改革問題。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恒山表示，‘應從總體上收縮事業單位的規模。應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

⁷ 參考值見新華社北京 2006 年 11 月 9 日電：〈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國企改革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報道內容之一是，“據國資委統計，目前……中央企業職工約 1053 萬。”如果再加上金融、鐵路等行業中壟斷企業的職工，目前國有產業單位職工 2988 萬人中，國有壟斷企業的職工大約佔一半。但是，在這個報道中，國有工商企業的職工為 4300 萬，這與《中國統計年鑒（2006）》中國有企業職工的人數不符，故未採用。

國有單位，特別非公有制單位的就業人員將因此激增千萬以上。

以上這些數據粗略地反映了我國非農產業的就業所有制結構（未涉及純農戶），以及在未來五年中可能出現的主要走向。但是，國有單位就業人員減少的底線在哪裡，仍然難以確定。

二、勞資雙方的人員比例：

9 比 1，雇主中“個體老闆”最多

為了描述一個巨大的就業群體中的勞資關係，首先應該將就業人員中的雇主（俗稱“老闆”）和雇員進行數量上的區分。

第一，非國有單位的情況：2005 年底，城鎮法人單位、城鎮個體就業人員、鄉鎮企業和鄉村私營企業就業人員為 43965 萬。⁸ 在這個總和中，減去 6488 萬國有單位就業人員以後，城鄉非國有法人單位和城鎮個體經濟的就業人員為 37477 萬人。直觀地說，2005 年有約 3.8 億人在非國有單位就業。⁹

以國家統計局 2004 年全國經濟普查報告公佈的企業法人單位的數據為背景，¹⁰ 扣除其中 19.2 萬戶國有企業後，其它 305.8 萬個非國有企業法人單位按照每個企業一個法人代表計，其企業雇主也

⁸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農村個體經營戶就業人員 2123 萬未計入，因為他們和農戶是緊密混合在一起的，勞動和經營的季節性強，並且很少有僱傭勞動關係。

⁹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¹⁰ 2005 年 12 月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的數據顯示，2004 年全國二、三產業的企業法人單位 325 萬個。其中，國有企業、國有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共 19.2 萬個；集體企業、集體聯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共 45.6 萬個；其它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 40.6 萬個；私營企業 198.2 萬個；其它內資企業 6.2 萬個；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 15.2 萬個。

是 305.8 個（其中私營企業 198.2 萬戶，雇主也是 198.2 萬個）。¹¹ 個體經營戶 3921.6 萬戶，從業人員 9422.4 萬人，戶均 2.4 人。雇主近 4000 萬人。¹² 2004 年底，非國有單位大大小小的雇主總數在 4305.8 萬左右。

2005 年非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約 37477 萬人，其中減去上述雇主人數以後，雇員約為 33171.2 萬人。在非國有單位的全部就業人員中，企業雇主和個體戶雇主所佔比例為 11.5%。雇員與雇主的總體比例大約是 8.9 比 1.1。

第二，國有部門情況：按每個國有法人單位一個法人代表計算，2004 年國有部門企、事業單位等的雇主約為 211.1 萬個，¹³ 雇

¹¹ 國家工商總局的資料顯示：2005 年底私營企業為 430.1 萬戶。按法人代表計算，雇主為 430.1 萬個。這與本文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材料估算的數字相差比較大。根據作者對政府各部門關於私營企業戶數數據的比較分析和在東、中、西部的實地調查，認為關於私營企業的數據，採用國家統計局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因為，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與財政部、稅務總局、全國總工會掌握的數據比較一致。國家工商總局關於私營企業戶數的數據偏大。如 2004 年底，他們的數據顯示全國私營企業為 365.1 萬戶，與國家統計局 2004 年進行的全國經濟普查的相關數據（私營企業 198.2 萬戶）相差比較明顯，多出 166.9 萬戶。雖然《中國統計年鑒》每年都採用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私營企業戶數的數據，但是，這裡沒有採用。

另外，這裡作者對之前計算雇主的方法進行了調整。原來，每個非國有企業是按照兩個投資人和主要管理者計算的（〈2006 年三季度非國有經濟發展報告〉，《中華工商時報》2006 年 10 月 27 日第七版）。

¹² 2005 年 12 月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顯示，“2004 年末，全國共有從事第二、三產業的法人單位 516.9 萬個。其中，企業法人單位 325.0 萬個，機關、事業法人單位 90.0 萬個，社會團體法人單位 10.5 萬個，其它法人單位 91.4 萬個。……個體經營戶 3921.6 萬戶”。

¹³ 在《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中，非企業法人單位的經濟性質沒有被劃分所有制類型，故這些法人單位的雇主未計入非國有部門。按照一般經驗，這些單位的資產多數與國家財政撥款和國有單位的投資有關係，故將其計入國有單位。這樣，全部 516.9 萬個法人單位減去 305.8 萬個非國有企業法人單位以後，剩餘的 211.1 個法人單位均視為國有單位。

主人數佔 2005 年底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的 3.3%。雇員與雇主的總體比例是 9.7 比 0.3。

第三，國有、非國有單位的總體情況：2004 年底國有、非國有各經濟類型單位的雇主總數約為 4516.9 萬人，相當於 2005 年城鄉法人單位和城鎮個體就業人員總數的約 10.1%。雇員與雇主的比例大約是 9 比 1。

發展中的非國有單位是促進就業的重要渠道，一些業主也能夠嚴格依法或憑良心善待雇員。但是，國家的執法檢查和一些重要數據顯示，在廣泛的社會層面上，人數少的雇主階層（包括部分國有單位的雇主）和數量龐大的雇員階層之間的矛盾，即勞資之間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還是在逐步發展。這個涉及數億人的矛盾“協調處理的難度也相當大”。¹⁴

三、非國有部門勞動權益狀況差： 凸顯勞資協調機制發育滯後

現在非國有單位，特別是私營部門雇員的勞動權益狀況（包括收入水平）並不讓人樂觀，就業質量低下是普遍存在的事實。這對改善全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實現“社會和諧”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假定這種狀況在未來 5~10 年中不能獲得實質性的改進，隨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人數巨增，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面積將繼續擴展，糾正起來更為吃力，社會不穩定的潛在風險會進一步增加。

2005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我國的企業在貫徹實施

¹⁴ 2005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講話。轉引自關懷：〈建設和諧社會，企業應依法履行社會責任〉，《工人日報》2006 年 3 月 27 日。

《勞動法》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在建築、輕工、服裝、餐飲服務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中，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五大問題是：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期限短、內容不規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沒有得到全面執行。¹⁵ 超時加班現象比較普遍。社會保險覆蓋面窄、統籌層次低。勞動保障監察力度不足。¹⁶ 這導致了勞資關係的緊張度在以多種形式發展。

200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指出：

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的勞動關係非常複雜，協調處理的難度也相當大。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有些問題還比較突出。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由此引起的勞動爭議案件和糾紛大幅度上升，法院受理的案件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有些引發了職工群體性事件，有的還在國內外造成了不良影響。¹⁷

2005年，在三資企業和農民工集中的廣東省，省總工會主席的文章指出：

從目前來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中，最大量的案子、最集中

¹⁵ 聯合國UNDP《中國人類發展報告：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的報告指出，一些農民工較為集中的地方（如廣東、福建）十多年沒有漲工資，實際工資下降（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39頁）。另外，我們也看到，業主暴力對付工人討工資的事件年年見諸報端；全國各地的“血汗工廠”並不少見。

¹⁶ 〈五大問題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人民日報》2005年12月29日。

¹⁷ 轉引自關懷：〈建設和諧社會，企業應依法履行社會責任〉。另外，在2000年，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總工會主席尉健行也指出，在“新建企業”（指非公企業——引者註）中“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問題屢屢發生……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引自浙江省非公有制企業工會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會議文件選編》2000年11月，第12~13頁）。

的問題是勞動關係問題。¹⁸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大批農民工在企業勞動是低工資、無社保，但他們在村裡留有承擔社會保障功能的土地和房屋。這幾年來，這種低工資、無社保現象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無序競爭，已經衝擊到越來越多的城裡人、大學生。其中，多數城裡的年輕人和大學生是沒有房屋和土地充當生存底線的。在這個特定角度上看，如果除去了家庭幫助的因素，這些每年為非國有企業所吸納的數百萬的新生代雇員的生存狀況還不如農民工。他們有可能成為進一步降低中國的結婚率和出生率的力量，加速“老齡化社會”的降臨和增加那個時期社會問題的壓力。

與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現象相對應的是，私營企業的利潤高速增長。比如，在工業企業利潤普遍下降的 2005 年，工業類私營企業的利潤增長達到 47.3%，2006 年上半年達到了 52.9%。這些利潤中包含了雇員在低工資、欠薪、違法加班、無社會保障、生產安全條件惡劣等方面損失的份額，或者說，包含了雇員合法權益損失的部分。就這一部分所得而言，不僅按照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雇主對於雇員的剝削；即使按照薩繆爾森早年在《經濟學》中說的，也是“剝削”。¹⁹

這裡，以兩個農民工比較集中的代表性行業——製造業和建築業 2004 年和 2005 年的有關綜合數據，²⁰ 來計算低工資使利潤暴漲的事。

¹⁸ 轉引自關懷：〈建設和諧社會，企業應依法履行社會責任〉。

¹⁹ 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冊第 29 章，商務印書館 1982 年 8 月。

²⁰ 數據來源：行業的國企職工和工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農民工的工資和就業人員的情況，是根據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第 7~8 頁的有關數據，結合《中國統計年鑒（2006）》有關數據計算的。

2005 年製造業國有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 16963 元，2004 年農民工的年平均工資是 9360 元，兩者相差 7603 元。

2005 年製造業國企 599 萬職工的工資總額是 1016.1 億元；而同樣數額的 599 萬農民工的工資總額是 560.7 億元；兩者相差 44.8%，差額為 455.4 億元。

農民工主要在非國有企業，尤其是在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從業。在這個角度上看，僅僅在工資差額這個項目上，僱傭同等數量的員工，非國有企業雇主就比國企多獲取了高達約 455.4 億元的超額利潤。而製造業的全部農民工（約為 2105.6 萬人）與國企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比較，農民工將為其各類型雇主提供高達約 1600.9 億元的超額利潤。

2005 年建築業國有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 16361 元，2004 年農民工的平均年工資是 9360 元，兩者相差 7001 元。

2005 年建築業國企 205.7 萬職工的工資總額是 336.5 億元；而同樣數額的 205.7 萬農民工的工資總額是 192.5 億元；兩者相差 42.8%，差額為 144 億元。在工資差額這個項目上，僱傭同等數量的員工，非國有企業的雇主比國企多獲取了高達約 144 億元的超額利潤。而建築業的全部農民工（約為 683.4 萬人）與國企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比較，農民工將為其各類型雇主提供高達約 478.5 億元的超額利潤。

也有企業主違法賺取利潤的案例。2006 年後期，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在代號為“利劍”的最低工資專項檢查行動中，已責令上千家企業限期支付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差額共計 60 多萬元，為勞動者追回二千多萬元“血汗錢”。²¹ 如果不“追回”，這些錢就是企業主的利潤。這種企業主違法賺取利潤的事，在前面引用的全

²¹ 2006 年 11 月 7 日《工人日報》記者高鑄成、李泓報道，深圳上千家單位被責令限期支付工資。

國人大有關執法檢查報告中被認為是“很突出”。如果再計入多數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障金²²和偷漏稅²³等等嚴重的問題，以及一些大型跨國公司醜陋的經營行為和避稅行為，不曉得非國有企業主高速增長的利潤中，違法所得佔有怎樣一個巨大的數額。

另外，考慮到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在環境、資源保護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可以看到，這些利潤中還包括了企業應該為“外部性”付出而沒有付出的費用。

財富就是這樣在合法與非法交織的行為中積聚、集中和大幅擴展規模。勞動者“有工作的貧困”²⁴就是這樣地在產生。

問題：新增的就業者們，在一種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狀況下工作，會具有怎樣的生態和心態？由此，在初次分配層面的工資上就被嚴重扭曲了的收入實況，在二次分配中能夠得到多少彌補？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不少窮人因病不去醫院，一些貧困家庭的子女退學，失業者因病自殺。這些事例一方面說明，加快健全二次分配機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說明，在比較嚴重的貧困條件下，對當事人來說，他與二次分配的連接機制是不存在的。

當然，政府對於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勞資關係狀況變化也不可

²² 國務院研究室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乏”。據平新喬的研究，2004年“內資類民營企業（不含個體企業）”職工參與失業保險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經達到80%。有關文獻參見全國工商聯非公有制經濟研究課題組《非公有制經濟深層次問題研究》，中國言實出版社2005年5月，第406、291、514頁。

²³ 例如，私營企業的稅收與其對GDP的貢獻不成比例。2003年私營企業的稅收祇佔稅收總額的約7.26%。張木生據此提出，根據我們國家含稅GDP倒算，私營企業的稅收應該再多出三、四千億元左右。否則，私營企業對GDP的貢獻就應該小得多。此前，賈紹華（2002）、戴建中（2004）等學者也提出過同樣的觀點。

²⁴ 錢慰曾：〈國際勞工局調查報告顯示：全球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工人日報》2006年11月1日。

掉以輕心。國企在 20 世紀 90 年代已然形成了“強資弱勞”的格局。21 世紀初，全國勞動仲裁部門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構成中，雖然非國有部門佔的比重最大（佔 72.9%），但是，按具體的企業類型比較，數量居第一位的就是國有企業。²⁵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中的勞資矛盾也是比較突出的。21 世紀以來，事業單位的改制包括人事制度改革“無法可依”強攻堅，照樣的“強資弱勞”不耽誤。²⁶ 例如，2005 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完成的《科技工作者權益保障狀況調查》的報告和相關信息顯示，“包工頭”現象越來越普遍，科學界貧富差距拉大。²⁷ 受訪的科技工作者認為，自身的權益保障狀況僅僅比個體戶、工人、農民這三個群體的狀況好一些。科技工作者普遍面臨職業風險，流血衝突時有發生。²⁸

總之，以上各方面都存在的“強資弱勞”的情況反映出，本該由政府、工會和雇主組織（或雇主）三方分工合作來規範、協調的勞資關係，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太明顯了，凸顯勞資協調機制發育滯後。

四、觸目驚心：“強資弱勞”與收入分配關係的多角度描述

總體上的“強資弱勞”格局導致了怎樣的收入分配狀況，在宏

²⁵ 《中國統計年鑒（2003）》，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²⁶ 夏小林：〈事業單位聘用制：“無法可依”強攻堅？— 改革要更注重法制、制衡、公平和增強公共服務〉，《香港傳真》2006 年第 31 期；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2006 年 7 月 3 日。

²⁷ 〈科學界貧富差距拉大，“包工頭”現象普遍〉，人民網科技頻道轉發《江南時報》文章 2006 年 8 月 22 日。

²⁸ 李松濤、李健：〈調查發現中國科技工作者普遍面臨職業風險〉，《中國青年報》2006 年 8 月 21 日。2006 年 6 月 9 日《新京報》報道，“北京建工研究院原院長、書記被下崗員工殺害”。這個“下崗員工”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中年工程師。

觀、微觀和社會層面的後果如何？鑒於 2006 年以來關於收入分配制度的衆多討論中，有關改善雇員中的最大多數人，即工人收入狀況的文章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以下特別地大段引用全國人大常委、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周玉清在 2006 年 7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來較為系統地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在職職工、離退休職工是城市貧困戶主體。戶主為企業的在職職工和離退休職工的城市貧困戶佔整個城市貧困戶的 86.9%，是城市貧困戶的主體。

第二，宏觀層面職工工資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過低。1991~2005 年，職工工資總額從佔 GDP 的 15.3% 下降為 11%。（可以比較的是，1952~2000 年，美國雇員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 66.9% 上升到 70.5%。其中，1969 年曾經達到最高點 73.7%。——引者註。²⁹）

第三，微觀層面的問題更爲嚴重。一是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甚至幾年沒有增長。據全國總工會 2005 年對十個省份中的 20 個市（區）1000 個各種所有制企業以及一萬名職工的問卷調查，2002~2004 年三年中，職工工資低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人數佔 81.8%，比上一個三年（1998~2001 年）增加了 28 個百分點；祇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一半的佔 34.2%，比上一個三年（1998~2001 年）增加了 14.6 個百分點。更有甚者，還有 12.7% 的職工工資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次調查還發現，2002~2004 年三年中，港澳臺企業年均效益增長 33%，而職工工資增長爲零。在天津等五個城市的紡織企業，90% 的企業職工工資三年分文未漲。

二是企業普通職工與經營者工資收入相差懸殊。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004 年對 1883 家各類企業調查，企業總經理與普通職工年平均收入相差 3~15 倍的佔 61.2%，相差 15~25 倍的佔 14%，相

²⁹ 坎貝爾·R·麥克南等著：《當代勞動經濟學（第六版）》，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 543、546 頁。

差 25~50 倍的佔 7.4%，相差 50 倍以上的佔 6.4%。

三是企業工資分配秩序混亂。比如，勞動定額畸高；壓低計件工資單價；大量違規使用勞務派遣工等等。另外，拖欠職工工資和不依法給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現象依然存在。在整個社會收入分配格局中，企業職工是收入最低的群體之一。

第四，企業職工收入過低狀況的長期存在，在社會上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一是職工心態嚴重失衡。一些職工認為，改革成本過多地由企業職工承擔，顯現社會不公平。全國總工會對萬名職工問卷調查表明，有 64.9% 的職工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下層。因而不少職工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在蔓延，對改革的認同程度在下降。

二是影響了職工隊伍內部的團結。許多職工在座談會中表現出對企業內部分配不公的嚴重不滿。

三是因勞動報酬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不斷上昇。2005 年全國立案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 31 萬件，其中勞動報酬爭議案件 10.3 萬件，佔立案總數的 33%，是各類案件中比例最高的。

四是因分配不公心理失衡而引發的職工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2004 年因工資低和企業改制利益受損等原因引發的職工群體性事件佔當年全國整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 20.92%。³⁰

至此，“強資弱勞”多側面負面影響的嚴重性已經躍然紙上，觸目驚心。所以，在這個自由放任成份非常大的勞動力市場模式的支撐下，GDP 的規模是高速擴大了，企業的利潤和經營者收入也高速增長了，但中國一路摸黑走下去，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發展，在涉及數億體力和腦力雇員的勞資關係上，以及在收入分配和社會穩定方面是要出大問題，並給各種內、外顛覆勢力以可乘之機的。

³⁰ 周玉清：〈企業職工工資過低與政府調控責任〉，《中國經濟時報》2006 年 7 月 28 日。

五、勞資關係協調機制“欠賬”多：時不我待

糾正“強資弱勞”格局，形成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不容易。那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用了二百多年的時間。當下，這些國家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又在與全球化較勁中掙扎。

目前，中國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建設面臨“欠賬”多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形成的僱傭勞動關係，從頭就是在沒有《勞動法》的“初始條件”下高歌猛進，與地方政府的“單純GDP觀點”相得益彰，使1995年1月才實行的《勞動法》與血汗工廠層出不窮的現象多年來並行不悖，並形成了至今仍然頑固不化的“路徑依賴”。有的官員和學人或者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政策意識，或者照搬新古典經濟學，刻意迴避和淡化勞資矛盾問題，鸚鵡學舌，在主流媒體上公開反對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反對工會作用，反對最低工資制度，維護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更是加重了新時期建設社會和諧的擔子。

當前，我們要正視的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勞資關係的協調機制祇是“初步形成”，³¹現存問題不容忽視。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4月發表的一份全國性調研報告顯示，目前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現行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執法監查力量嚴重不足，造成在一些方面無法可依，另外在實際上還形成了“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比比皆是”。2、政府管理和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地方“在處理勞資關係時屁股往往坐到了投資

³¹ 2002年4月29日新華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2006年11月9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經濟日報》發表的〈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2010年）〉中，重複了這個基本判斷。

者和企業主一邊”。³² 另外，這裡做出補充的問題是，3、三方協調機制不健全。首先，是已說過的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場和行為出現了偏差，其中不乏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如典型的“黑官紅煤”現象。其二，是許多企業工會缺乏維權傳統，缺乏獨立性和工作經驗，組織和培訓制度也不健全。在非國有企業的工會建設中，這些問題更為突出。其三，是雇主組織大面積缺位，組織網絡不健全，人力、財力、信息網絡薄弱，缺乏參與協調勞資關係的傳統、專業人才和知識，工作方法簡單。4、特別要提到的是，在以中小企業為就業主渠道的大背景中，區域性／行業性集體談判制度的發育嚴重滯後，並缺乏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而國際經驗和國內的已有經驗表明，這種集體談判恰恰是協調中小企業內部勞資關係、維護流動性較強的雇員的合法權益的最有利的低成本方式。³³

在勞資關係協調機制不健全的環境中，近年來興起的提倡企業社會責任的呼籲在應對“貿易制裁”上有直接的實際意義。但是，正如近期的“富士康事件”所顯示的，在政府和工會的作為有缺失、力量不足的條件下，商業性媒體的作用有限並十分軟弱。跨國公司作為不力也為人所詬病，而國內其它非政府組織在哪裡作用，難得為人所見。倒是國外一些組織在及時發揮“說話”的作用。進一步看，促進媒體和廣大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又在哪裡？³⁴ “富士康事件”的拷問是，在調整勞資關係的機制不健全和執法不嚴的環境中，軟性實施機制的企業社會責任能夠在中國走多遠？這個問題的政策性含義是：建立比較完善、有

³²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第 16 頁。

³³ 夏小林：〈私營部門：勞資關係及協調機制〉，《香港傳真》2004 年第 13 期；《管理世界》2004 年第 6 期；2005 年 11 月 7 日人民網理論頻道“特別關注”欄目。

³⁴ 劉武俊：〈“富士康訴訟”凸顯法制“亞健康”〉，《中華工商時報》2006 年 9 月 8 日。

效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是全面倡導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前提條件之一。³⁵

另外，“富士康事件”和中國血汗工廠著名的“加班”制度還表明，普遍而長期的“加班”具有明顯減少企業吸納工人的作用。在美國，長期以來企業的“加班”衝動是受到法律嚴格規定的高額加班費限制的，所以，為了節約費用，每年的企業總工時中“加班”時間非常少，³⁶這促進了就業。換句話說，就是政府放任市場會減少就業。放任的市場會扭曲增長與就業的關係，並從負面影響增長。

哈耶克認為，工會權利是導致英國經濟衰落的唯一最重要因素。弗里德曼也反對工會，主張勞動力市場自由化。20世紀70年代保守黨上臺執政，深受這兩人影響的撒切爾首相在接受了哈耶克熱忱的恭賀以後，發威摧毀了英國原有的勞資關係協調體制，取消了最低工資保護。十多年後，在1994~1995年，英國的《財經時代》不斷發文，揭露在保守黨政府的領導下，“每小時僅有兩英鎊收入的血汗工廠比率更普遍了”。“不平等不斷擴大，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大約1300萬成年工人每小時賺不到2.5英鎊（這是社會最低工資率）”、“雇員一週工作50~55小時是經常的事”。但是，放任市場自由調節並沒有改變在20世紀80~90年代“英國已經成為低成本、低生產率、低技術生產和低服務效益

³⁵ 在“富士康事件”期間，《環球企業家》記者程亞婷在深圳進行了採訪，她在《環球企業家》2006年10月號〈“血汗工廠”終結者〉的報道中指出，在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資福利處副處長張國玖看來，最惡劣的情形首先是拖欠工資，再接下來才是嚴重的超時加班，“我們強調一步步持續地改善，而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讓所有企業都達到標準”。

另外，她的報道顯示，“富士康事件”發生後，企業“旁邊的一家飯店的老闆娘雖不清楚最近的‘富士康風波’，但她還是感覺到，這段時間以來富士康控制加班的時間嚴了許多，晚上……工人就餐的高峰，比以前有所提早。”

³⁶ 有關資料反映，由於美國的工會弱化，近年在有的行業領域出現了一些倒退的現象。

的中心”，“英國的資金則繼續向海外發展”，失業、貧富分化等諸多社會問題更加尖銳化。³⁷ 放任市場自由調節的最後結果，是保守黨下臺，極右翼理論的公信力遭遇了破壞性的打擊。

拉美一些國家在 20 世紀經過“華盛頓共識”的洗禮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左派上臺後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在糾正“強資弱勞”局面和緩和社會分裂方面是舉步維艱。³⁸

一位英國歸來的學人說，2005 年 11 月，在哈耶克的支持下建立的英國保守思想庫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舉辦了第 14 次 Hayek 年度講座，演講人是英國的傳媒專家和政論評論家。其中的一個題目是《中國是哈耶克的好學生，歐洲不是》。如果中國真正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了，中國就不是這種倒楣的“好學生”。

六、建議：狠抓落實現有制度，制定 五年內彌補制度欠缺的日程表

當前，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建設滯後於國有企、事業改革快速推進和非國有部門的高速發展，這對改善收入分配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成一種最大面積的人群壓力。

以上一些分析撇開了 4.9 億農業勞動者不論。但是，這些年來在全國農民的純收入結構中，工資收入的比重已經不斷上昇，2005 年已達到 36.1%，比 2004 年增加了 2.1 個百分點。³⁹ 工資收入已經成為了影響農民生活、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個非常敏感而重要的因素。而農村勞動力（包括數千萬失地農民）進入非農產業打工，多

³⁷ 有關英國的資料均引自約里斯·范·魯塞弗爾達特等主編的《歐洲勞資關係——傳統與轉變》第二章，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³⁸ 陳泰：〈風繼續吹：玻利維亞左翼報告〉，《香港傳真》2006 年第 50 期。

³⁹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數是進入非國有單位當雇員。今天非國有部門雇員們的勞動權益狀況，既影響到他們今天的生活，更預示著他們明天的生活。加快完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既關係到 4.9 億農民，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保障。

2005 年底，中國城鄉就業人員約為 7.6 億。從中減去約 4516.9 萬雇主之後，其它各類企、事業單位的職工、自由職業者和農民約為 7.2 億。協調勞資關係，從不同角度都涉及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所謂皆是利益攸關者。協調勞資關係，關注雇員，關乎絕大多數國民，關乎改善收入分配的大格局，關乎國本，是最大的社會問題。

16 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一方面是協調全社會各種重要關係的戰略性規劃和綱領性文件，另外一方面，由於《決定》中對於建設社會關係協調機制做出了全面的規劃，把“發展和諧勞動關係”和“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並且與“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等重要問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文字表述上給予改革、開放以來空前的“濃墨重彩”，所以，又可以視為是發展和諧勞動關係、健全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戰略性規劃和綱領性文件。

當前，重要的是要狠抓落實現有制度，制定五年內基本彌補制度欠缺的日程表。建議在“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方面，“國家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會議”要聯絡全國人大和有關係的黨、政部門等，制定綜合配套改革的政策框架。主要內容是：改進、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和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懲治腐敗，嚴肅黨紀政規，著力在制度上端正地方政府的行為；修改《勞動法》，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在資金和人員上真正落實增強執法力量的政策，完善法制和監管；發展工會組織，創新工作方法，特別是發展區域性 / 行業性集體談判制度，增強工會維權能力；培育、鼓勵和發揮雇主組織在協

調勞資關係特別是在集體談判中的作用。要認真總結近些年來中央和地方在協調勞資關係方面成功的多種新鮮經驗，吸取建國初期黨和政府協調勞資關係的成功經驗，組織人馬，政府、工會、雇主組織和其他國、內外利益攸關者一起努力，制定中國協調勞資關係的總體戰略方案，並針對不同勞動領域的具體特點制定和完善有關的各項具體方案，完善全國和地方的勞資關係信息系統，大力培養研究和處理勞資關係問題的專業人才，加快建設全面、有效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步伐。同時，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建設。

另外，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增進社會公平公正，還要研究新形勢下的新課題：如何發揮總量日益擴張的國有資本增加就業的功能。要“減員增效”和“增效增員”兩條腿走路。在解決體制弊病和贏得效率的前提下，即使依照美國的經驗，國資也要在增加就業和增進社會公平上發揮積極作用，在“發展和諧勞動關係”上作表率，不能“自廢武功”。

這些方面的政策性選擇有：

一是國家要保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重大技術創新等重要領域的有效投資不斷增長，實現“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⁴⁰ 不排除為解決就業問題在勞動密集型領域進行多種形式的有效投資的政策選擇。

二是在保障壟斷領域國有企業健康發展的同時，還要保障在競爭性領域已經開始取得制度、效益創新的國有及其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的健康發展，⁴¹ 發揮它們在穩定就業和增加就業方面

⁴⁰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2006年3月第23輯，第81頁。

⁴¹ 在被稱為“對私有化進行了最廣泛分析”的《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中，英國牛津大學的作者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提出了兩個值得令人思索的論點：“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和監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問題本身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大”、“公有制和競爭完全可以相互兼容”（《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重慶出版社2006年5月，第3、57頁）。這些

的積極作用，而不是“一退了之”。⁴²

三是發揮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傳統優勢和工會作用，政府支持，率先在國企全面實現“發展和諧勞動關係”（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為其它類型企業做出表率，而不是放任一些國有企、事業單位在“尋底競爭”中與血汗工廠同流合污。繼而發揮數億雇員中數千萬共產黨員和衆多共青團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全面參與“發展和諧勞動關係”的社會活動。⁴³“不信春風喚不回”。

七、理論評論：私權、⁴⁴市場和公共服務的局限

在 2006 年探索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過程中，主流媒體上的一些文章在列舉和分析該問題各種成因時，可以論及發展問題和壟斷、腐敗等體制問題，就是不涉及市場經濟中客觀存在的私權、勞資關係對於該問題的負面影響。⁴⁵有的把形成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歸結為公共服務體制不健全，⁴⁶或者強調了市場、私權的不發

論點產生於兩位作者對 20 世紀 80 年代英國私有化運動和國有企業的廣泛而細緻的分析，以及對主流經濟學的深刻瞭解。

⁴² 夏小林：〈國資轉讓、減持底線要堅持社會公平原則——試評國資委國資轉讓和減持底線的規定〉，《香港傳真》2006 年第 13 期；《經濟觀察報》電子版（全文）2006 年 3 月 24 日；人民網《強國論壇》（全文）2006 年 4 月 3 日。

⁴³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 189~193 頁。

⁴⁴ 本節使用的“私權”是指“財產所有權”。在《經濟學》第 40 章中，薩繆爾森將“財產所有權”列為造成收入差別第一位的原因。他還這樣寫道，“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

⁴⁵ 但是，前些年經濟學界是有部分研究報告涉及了這類問題的。

⁴⁶ 世界銀行的一位中國籍專家說，中國“社會公平方面的問題，其原因並非是由於我們在引入市場機制、私人產權方面做得太多，而是由於在公共治理的改革方面做得太少。”“總結起來看，當前我們面臨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本質上是公共治理方面的改革與經濟領域的改革相比嚴重滯後的結果。”“看一看當今世界，實際的情況並不是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張春霖：〈公平何處

達和沒有實行代議制（即議會制）。⁴⁷

但是，即使以近十多年來的全球化進程和西方經濟學已經獲得的新進展為背景來看，這些分析方法和論點對於現實的解釋力和演繹出來的相關公共政策的效用也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一）在“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無論在實行議會制的發達國家，還是實行議會制等政治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加劇的現象是目不暇接的。美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與中國並駕齊驅。在歐、美、日和臺灣地區已經出現了中產階級“土崩瓦解”的現象。這一切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 / 政治 / 社會理論和政策實踐提出了嚴重的質疑，⁴⁸ 也向其它非馬克思流派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提出了挑戰。理論和政策需要創新。

近十年有越來越多的文獻反映，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私有化和

求？》，《比較》第 23 輯，第 69~86 頁。

⁴⁷ 趙曉：〈盛世危言：縮小收入差距難度高過振興經濟〉，《上海證券報》2006 年 11 月 2 日。作者在文章中寫道，“陳志武在〈收入差距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證明，代議制（即議會制——引者註）政府+市場經濟模式下人民的收入差距趨同速度最快，而據筆者的分析，權力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因素最為要害，這也證明了中國由非代議制政府與非市場經濟（‘第四類國家’）走向非代議制政府與市場經濟（‘第三類國家’）之路越來越走不通。在這種背景下，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來限制權力越位，減少權力參與壟斷競爭，乃是根本之道。在 20 多年的單兵突進的經濟改革之後，中國必須循序漸進地啟動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真正下決心厘清公權力與私權力的界限，厘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

⁴⁸ 例如，1979 年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費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一書中認為，“生活就是不公平的”。在這種宿命論的認識下，他提出的增加社會福利的政策選擇方向是，應該取消福利制度（包括逐步取消社會保險）。同時，把“自由”和“機會均等”放在首位，這樣才能阻止特權地位制度化，從而使每個人都享有更為圓滿和富裕的生活。他反對工會，主張勞動力市場自由化（轉引自朱彤書主編《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456~460 頁）。但是，近 20 多年來這種自由放任的選擇不僅沒有在任何一个發達國家徹底地實行過，並且因其在少數發達國家的部分實行已經受到來自實踐和理論界越來越強烈的批評。深受其影響的撒切爾、里根等首腦人物因此而受到的批評並不比他少。

全球化以來，亦即“市場機制、私人產權方面做得太多”和美式民主到處推行以來，一方面是總體財富的增加，或者還應該加上在有的落後地區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前資本主義狀況下的貧困現象的減少，另外一方面，無論是全球，還是實行議會制和公共治理水平比較高的美、英、日等重要的資本經濟體內部，財富的集中度在提高，原有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遭到衝擊和削弱，貧富差距都在拉大，社會公平狀況都在下行。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都說，全球化中貧富差距拉大了，出現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極端不平等”。收入分配問題是舊賬未了，又添新賬。幾組典型數據如下：

經濟全球化進程(本質特徵就是私人資本擴張、貿易自由化等)中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全球化是“極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006年11月，聯合國發表的《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

最新數據顯示，全球貧富差別仍在擴大，無論在國與國之間還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都是如此。……擺在人類發展面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消除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極端不平等。⁴⁹

稍前一些時候，聯合國的另外一份報告指出，

貧富差距擴大……貧窮國家發展遲緩已成為“地區衝突、國內戰亂和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原因”。⁵⁰

2006年10月，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世界青年就業趨勢》報告指出：

⁴⁹〈聯合國報告：全球20%人口掌握80%財富〉，《新華每日電訊》2005年8月28日；〈不公正的全球規則加劇貧富分化〉，《21世紀經濟報導》2005年10月1日；〈中國居“人類發展指數”第81 全球貧富差距仍在擴大〉，人民網2006年11月9日。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⁵⁰2006年7月3日中國經濟網：〈全球貧富差距加劇：歐美人均收入是埃塞俄比亞35倍〉。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在 1995 年到 2005 年的十年裡，全球青年失業率呈明顯上昇趨勢，青年就業形勢愈加嚴峻；另外，現在全世界青年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是失業，就是生活貧困。

報告說，1995~2005 年期間，15~24 歲的青年失業人數從 7400 萬增加到 8500 萬，該年齡段的失業率增長了 14.8%。這樣的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

此外，有超過三億的青年雖然有工作，但卻生活在日均收入兩美元的貧困線以下，佔在職青年總人數的 56%。

報告還指出，各國女青年的失業情況更為糟糕。例如，南亞女青年的就業率要比男青年低 35 個百分點。⁵¹

從這份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到在當今的世界上，在工會作用弱化的同時，不僅是就業問題日益尖銳化，而且強勢資本已經把一半以上青年雇員的收入水平壓到了貧困線以下。放眼全球，“與國際接軌”，國內部分大學生的工資收入預期標準低於農民工，甚至提出“零工資就業”，以及“在職職工成為城市貧困戶的主體”，真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兒了。

另外，還在 2006 年初，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的一份報告就顯示，全球的“經濟增長無助於窮人脫貧”。⁵²

近幾十年來，在實行議會制、公共服務體制和市場體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儘管進一步推進了私有化和市場化，財富和收入分配方面還是發生了日顯尖銳的新問題。⁵³

2003 年在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出版的《一種批判的

⁵¹ 錢慰曾：〈國際勞工局調查報告顯示：全球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工人日報》2006 年 11 月 1 日。

⁵² 〈經濟增長無助於窮人〉，新華社《參考消息》2006 年 1 月 25 日。

⁵³ 但是，在世界銀行《2006 年世界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中，對於發達國家公平狀況後退現象的分析是非常淡薄的，並且幾乎看不到深入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

經濟學史》中，英國人約翰·米爾斯利用充分的數據描述了 20 世紀後期，特別經過私有化高潮洗禮後，實行福利制度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退步”趨勢。這些事實，比較充分地顯示了私有化（和私權）能夠對於財富和收入分配發生負面影響的問題。

“在剛剛逝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存在一種退步現象，即從收入和財富分配方面較低程度的分化狀況退步到較高程度的分化狀況。而那種較低程度的分化狀況是人們在 20 世紀經過整整四分之三世紀左右的奮鬥才得以實現的。”與此同時，私有化和資本自由化並沒有幫助宏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在歐洲），或在提高就業質量上做出貢獻（在美國）。⁵⁴

早些時候，加爾布雷斯等人在分析同一時期的情況時，從基尼係數方面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加爾布雷斯等人在 2001 年發表的文章中，對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 1969 年到 1992 年的基尼係數數據進行了篩選，並對數據最完善的英國，美國和日本的基尼係數作了回歸分析，得出了這一結論：越是經濟增長後期，收入差距越是擴大。最近一位學者（Chulhee Lee）對美國 1968~2000 年間的數據進行了研究，證實了此時期美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的事實。之前及隨後的諸多實證研究也證實了以英國、美國以及其它一些經合組織成員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自 1970 年代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即收入差距拉大是一個國際性話題和全球性問題，即便是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日本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就著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和社會福

⁵⁴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商務印書館 2005 年 11 月，第 45~50 頁、第 61~69 頁。

利制度，但在當代依然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問題。⁵⁵

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英國以及其它一些經合組織成員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消息更是接踵而至，不絕於耳。而這些消息又都與私權擴張，財富集中，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日漸削弱，雇員相對收入下降、就業狀況不佳相關。這種收入分配狀況下行的現象，也意味著民主參與制遭到削弱。

美國基尼係數 0.469，創 40 年來最高記錄，堪與中國的 0.47 媲美。最新的數據和評論來自《國際金融報》2006 年 8 月 31 日的報道：

美國華盛頓消息：當地時間 8 月 29 日，美國人口普查局發表的國內家庭消費支出調查報告顯示，截至 2005 年，美國的基尼係數已連續三年上昇。此次 0.469 的數值更是創下了 40 年來的新高。

報告顯示，美國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美國最富有的 20% 家庭中位收入上漲了 2.2%，即 3592 美元，達到 16.6 萬美元，佔全體收入的 50.4%。而最貧窮的 20% 家庭中位收入僅上昇了 0.2%，即 17 美元，達到 11288 美元，佔全體收入的 3.4%，創下自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以來的最低比例。

美國全國共有 3700 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佔總人口的比例為 12.6%。

儘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但許多美國人無法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險服務。根據普查結果，在美國全國，大約有 15.7% 的人口（即 4660 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五年來，這個數字一直呈上昇趨勢。

一位美國學者撰文稱，這份報告顯示，“政府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毫無作為，相反，布什政府的政策祇會令貧富差距擴大。”而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一直強烈指出，美國經濟的發展並未令全體民眾受惠，而是向富裕階層傾斜，貧困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很可能成

⁵⁵ 楊英傑：〈“收入差距拉大”是全球性問題〉，《上海證券報》2006 年 6 月 12 日。

為 2006 年 11 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的焦點問題。⁵⁶

與收入差距擴大相關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企業利潤連昇，工人實際工資反降”（其中包含了美國中產階級收入水平下降的信息）：

據《華盛頓郵報》下屬的 *PARADE* 週刊報道，美國經濟自 2001 年以來一直在增長，但工人的收入不昇反降。工人的收入為什麼呈下降現象呢？答案是：美國企業的利潤擠佔了美國工人的收入。穆迪經濟網站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指出：“國民經濟收入的企業利潤部分是 60 年來最高的，而工人工資則是歷史新低。”另外，“根據美國勞工部最新統計數據，美國工人 2005 年的平均週薪是 659 美元，其中律師為 1609 美元，經濟學家為 1569 美元，脊椎指壓治療者 1531 美元，航天工程師 1362 美元，醫療健康服務經理 1089 美元，貸款顧問 861 美元，小學教師 826 美元，殯葬工 768 美元，馴獸師 482 美元，洗碗工 296 美元等。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平均週薪比 2004 年減少 1.9%。所有生產一線的工人小時平均工資 2005 年為 16.11 美元，較前年也略有下降。此外，美國工人的退休金及醫療保健等應享受的待遇也被雇主打折了折扣。”⁵⁷

工人的待遇下降，與工會力量的弱化有直接關係：

美國勞工部（Labor Department）2005 年報告顯示全國 12.5% 的職工，即 1570 萬人，是工會會員（1986 年為 20.1%），而私營企業中工會成員的比例祇有 8%，半個世紀前，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聯~產聯合併的時候有 1600 萬會員（16 millions），其中私營企業工人會員佔 40%，2005 年這個比例降到 8%。目前，美國工

⁵⁶ 魏紅欣：〈美國貧富差距創下 40 年新高〉，《國際金融報》2006 年 8 月 31 日。

⁵⁷ 翁翔：〈美國企業利潤連昇，工人實際工資反降〉，《中國青年報》2006 年 3 月 14 日。

會無力反抗工時的加長、勞動條件的惡化、工資的低落、資本的海外投機。在某些行業，比如餐館業、成衣業、雜貨店、旅館業、肉類加工業等，工會工人的工資祇在法定的最低工資上下。克林頓時代的泡沫過後，2003年美國男性工人的實際平均工資不及1973年的水平。⁵⁸

英國富人佔據了更多的財富。英國《獨立報》報道，2004年夏季英國公共政策研究協會（IPPR）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雖然避開極右翼的“哈耶克陷阱”，走上了折衷調和的“第三條道路”，普通雇員的工資狀況有所改善，但是相對貧困和貧富兩級分化現象繼續加深：

布萊爾執政期間，英國富人和超級富有的人佔據了更多的財富。從1990年起佔英國10%的人口掌握了英國47%的財富（這是英國私有化高潮時期的結果——引者註），但是現在他們所掌握的財富已經佔到了所有財富的54%。同期，英國人均收入增長祇有45%，但是英國前一百家大公司的老總們的收入增加了六倍。

在英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1981年時所佔全部人口收入的比例為6.7%，到1999年這1%人口的收入佔到了全部人口收入的13%。1990年到2000年間，英國最富有的10%人口佔有的英國全部財富的比例從47%增加到了54%。從1990年之後，英國普通工資水平增加了45%，但是同期英國最強100家公司的老總的收入增加了288%，是普通工資增長的六倍。在1994年婦女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9.5%，到2003年婦女收入稍微增長，達到了男性收入的82%。⁵⁹

⁵⁸ 嚴海蓉：〈利益群體症：剖析美國勞工運動中的美國病〉，烏有之鄉網站《批判與再造》2006年9月11日。

⁵⁹ 章田、雅龍：〈英報告稱布萊爾執政期間英國貧富分化明顯加劇〉，中新網2004年8月2日。

在這種分化之下，新古典經濟學和社會學推崇的解困濟貧的四大藥方“機會均等”、“向上流動”、議會制和民主參與制度，仍然是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忽悠多數人、麻痹多數人的“光榮的夢想”，難得發揮實質性的神奇作用：

目前在英國，生於普通人家、屬於較低社會階層或有少數民族背景都可能成爲個人發展的障礙，這些情況都可能增加個人謀生的困難。英國民主參與的制度正在削弱，擁有社會地位和財富的人獲得了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報告的結論是，“英國目前遠遠不是一個公正的社會。貧困兒童人口比例比歐洲其它國家高很多，同時收入、財富佔有等方面的不平等依然十分嚴重。”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協會的社會正義委員會主任尼克·皮爾斯的評論是：“政府沒有始終如一地去努力建設一個公正、平等的英國。……英國政府目前應當引入政治辯論來討論如何建設一個公平、平等的國家。”⁶⁰

日本二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經濟增長沒有惠及“許多日本國民”。2006 年 6 月外電報道的標題就是《日民衆收入兩極分化嚴重，56% 國民生活艱難》：

日本厚生勞動省 6 月 28 日公佈的 2005 年度國民生活基礎調查結果顯示，年收入不到 300 萬日元的家庭和年收入超過 1000 萬日元的家庭均在增加，有 56.2% 的被調查者認爲他們的生活很艱難，這顯示出日本二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⁶¹

⁶⁰ 章田、雅龍：〈英報告稱布萊爾執政期間英國貧富分化明顯加劇〉。

⁶¹ 〈外電：日民衆收入兩極分化嚴重 56% 國民生活艱難〉，中國經濟網 2006 年 6 月 29 日。

2006年11月，日本經濟財政大臣提供的一份報告指出，日本經濟增長的利益主要體現在企業的高利潤上，許多日本國民對於經濟景氣大漲並沒有切身感受：

日本經濟出現戰後最長增長期，主因是出口。但是，國內消費疲軟。日本企業的高利潤並沒有給日本的普通工人帶來多少實惠，一些企業還在裁員。因此，許多日本國民對於經濟景氣大漲並沒有實際的切身感受。⁶²

“私有化”以來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收入差距擴大，其長期依賴的社會穩定器——中產階級慘遭分化瓦解、規模縮小的危機。“福利國家制度”也阻擋不住貧富分化加劇。這些現象挑戰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和其它相關理論。在這種已經十分明朗的局面下，中國對各種打扮的“洋教條”要有所警惕，不要盲目地“邯鄲學步”，自廢武功。

在收入差距擴大過程中，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的中產階級收入和工作穩定性下降，階級的規模縮小，陷入被市場／經濟結構變動力量在總體上分化瓦解的危機，並成為“選戰”的熱門話題。2006年，在一篇主題為〈美英日中產階級漸漸消失〉的文章中，就全面介紹這種全球化中的新現象。主要內容如下：

在中國，有中產而無“階級”這一結論還未來得及得到全社會的認可，“中產階級漸漸消失”的說法卻開始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流傳開來。

日本已經邁入“下流社會”。日本消費社會研究專家三浦展預言當今日本社會已經邁入“下流社會”。他在2005年9月出版的《下流社會：新的階層集團的出現》成為消費社會學暢銷書。日本

⁶² 〈日本經濟出現戰後最長增長期，國內消費不振依然帶來隱憂〉，《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11月24日。

主流媒體對其高度關注。作者認為，隨著社會開始上下分流，財富向上流集中，日本社會階層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下流社會》一書指出，2004年個人年收入低於600萬日元的已佔日本納稅總人口的78%，更有37.2%的臨時雇員月薪不到十萬日元。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的數字，在20~34的年輕族群中，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了13.3%。2006年1月底出刊的日本財經雜誌《鑽石週刊》，以〈上流社會vs下流社會〉為封面故事，探討“一個日本，兩個世界”。

與此同時，2006年1月底，管理大師大前研一的著作《中低階級崛起的衝擊》，更以國家財政與經濟結構的層次，直指“日本社會正往下流動”，一個中產階級消失的“M型社會”已在日本漸漸形成。這使得“下流社會”在日本沸沸揚揚。

人們不禁要問：曾經號稱“一億總中流”（即生活中等的國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日本中產階級難道已經分崩離析？日本真的進入“下流社會”了嗎？

日本媒體的評論普遍認為，通過《下流社會》一書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小泉出任首相之後，為紓解泡沫經濟遺留下來的1000兆日元財政赤字，採用了自由開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令整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加劇。如今的日本社會祇容許少數富人或有才華的人成為贏家，像多達500萬人的自由職業者和至少60萬的“NEET”一族，他們沒有固定的收入保證，也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不易積攢財富，所以才會貧者愈貧，翻身無望。《下流社會》一書揭示的正是所謂中產階級分崩離析之後，日本社會各階層之間無法實現的相互理解與溝通。

美歐中產階級也開始消失。據《天下》雜誌報道，美國也開始出現“中產階級消失”的現象，九成美國上班族無法享受到生產力上揚的成果，祇有收入最多的那一成人，享受到好處。愈來愈多美國中產階級感覺自己正淪落到下層階級。最近調查發現，在美國，

年收入 2.5~7.5 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但 2.5 萬美元以下，和 7.5 萬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1989~2003 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負債增加了 75%，在個人破產案中，中產階級竟高達 92%。

英國則出現“IPOD 世代”（iPod generation），被形容是一群沒有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稅負過重（over-taxed）、債務纏身（debt-ridden）的一代，對人生喪失熱情。

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在其 2006 年發表的新著《新資本主義文化》一書中也談到了“窘迫的歐美中產階級”問題。他認為，由於新經濟的影響，在美國，處於五等分中間 20% 的中層收入比 15 年前幾乎好不了多少。儘管房產升值了，但這筆資產很難作為普通收入進行評估；為了拉動消費，美國和英國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積債務，而歐洲的中產階級也好不到哪裡去。

臺灣中產階級蒸發。2006 年 3 月 15 日的臺灣《天下》雜誌也以〈下流社會 — 中產階級蒸發了〉為封面故事，刊登了系列文章，在介紹日本“下流社會”的同時，認為這種社會“向下流動”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臺灣也不例外。

我們大陸呢？“新失業群體浮出水面”的話題尤在耳邊回響，大學生就業難的矛盾又擺在了我們的眼前。我們是否也會有這種危機呢？⁶³

大面積的中產階級貧困化已經影響到美國國會的中期“選戰”。2006 年 11 月 5 日，來自臺灣中央社的消息：“共和黨告急：失業 + 貧窮，美中產階級變新貧階級”：

11 月 7 日美國國會期中選舉倒數計時，選情告急的共和黨候

⁶³ 祝碧衡：〈美英日中產階級漸漸消失，社會貧富分化加劇〉，上海情報服務平臺 www.istis.sh.cn，供稿時間：2006 年 3 月 30 日。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選人宣揚美國經濟一片大好；但民主黨候選人強調，許多中產階級因失業與貧窮問題增加，反落入新貧階級。中產階級壓榨效應所產生疑慮，使主打經濟牌的共和黨陷入苦戰。美股雖創新高，民眾實質薪資才是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⁶⁴

才過五天，新報道就出來了：共和黨全面失守，“美國參眾兩院盡落民主黨囊中”。⁶⁵道理很簡單，“伊戰”不利要丟失選票，加劇貧富分化更不得人心。

借用羅馬俱樂部最近一份長篇報告的話說，在採用了更多自由主義政策的富國內部，以及在臺灣地區兩極分化加劇，中產階級面臨蒸發的國際現象反映了“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局限”。⁶⁶這種現象也在事實上提示人們，要正視“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兩極分化加劇的普遍現象。

到目前為止，與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在具有比較完備的公共治理體制、具有更多的“機會平等”和私權更為發達的市場體制下，在公權腐敗和經濟秩序問題解決相對較好的富裕國家，在存在議會制和相對發達的公民社會制衡機制的體制下，無論是親近壟斷資本集團的布什執政，還是“親民”的布萊爾執政，兩極分化依然我行我素的在“大躍進”，社會矛盾也在起伏波動中發展。

以上現象的理論和政策性含義是：

1、把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原因歸結為公共服務體制不健全、缺乏“機會平等”，或者歸結為沒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代議制”的理論分析框架，或者在探索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時過分

⁶⁴ 倍可親網站京港臺時間 2006 年 11 月 5 日：〈共和黨告急：失業＋貧窮 美中產階級變新貧階級〉。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⁶⁵ 《新京報》2006 年 11 月 10 日報道。

⁶⁶ 魏伯樂、奧蘭·揚等：《羅馬俱樂部報告：私有化的局限》第五部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依賴了反腐敗、反壟斷、市場和私權不發達的分析框架，都不能容納、解釋發達國家在推進“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改革開放”30多年後，呈現出來的收入貧富差距拉大並在進一步發展的趨勢。也忽視了對於發展中的轉軌國家，私有化和代議制“改革”背後隱藏著的巨大的社會成本和風險。

2、如果據此去策劃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顯得缺乏比較成熟的、廣泛的、成功的國際經驗支持，也缺乏風險評估。雖然，這些分析中的各種因素，包括代議制涉及的擴大民主參與的因素，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以及在即定約束條件下的不同角度或程度上，都可能與改善收入分配問題發生關係。其中，有的重要因素具有兩面性，如私權和市場。在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私權和市場發展的基本指向都是拉大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對於中國來說，在增加財富、就業機會和改善收入分配上，它們祇能在特定層面充當有限的政策工具。“物極必反”。中國不能照搬別人的模式，也不能單相思式的以為反腐敗、反壟斷行為就抓住了解決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環節，——這祇是問題的一部分。

發展中轉軌國家基尼係數提昇最快、數值最高。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之外，發展中轉軌國家中也存在同樣的兩極分化加劇的問題。在這些國家中，轉軌使“不夠”的市場關係和私權加足了勁發展，財富呈現高度集中的趨勢，結果仍然是兩極分化加劇。

所不同的祇是，由於在這些國家缺乏比較有效、廉潔的政府治理體制和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體制，缺乏公民社會機制的有效制衡，市場秩序紊亂，內、外有勢力的私權往往俘獲公權、官商勾結、鯨吞公產、操縱媒體、魚肉百姓、槍殺左翼、肆虐成性、放蕩不羈，基尼係數提昇最快、數值最高，收入分配問題是加速惡化。以至有人說，在這些國家，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稀缺資源”。這些社會問題的發展，導致了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中，左翼利用自由派

鼓吹的“民主程序”上了臺，有的左翼政府並開始實行大企業和土地國有化，這令在鼓吹“民主化”上“始作俑者”的美國尷尬不已。

即使在情況“最好的”中國，相關情況的發展也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近期，聯合國的提醒是，中國“貧富差距亟待解決”，這將是“最大挑戰”。⁶⁷ 另外，“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經濟學家分析發現，在當今中國明顯比以前富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⁶⁸

這種現象的理論和政策性含義是：

1、對發展中轉軌國家，在促進私權和市場關係發展時，完善政府治理結構、公共服務體制，強調反腐敗、促進競爭，反對壟斷行為，對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就業和收入分配狀況，幫助窮人（“反貧困”）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但是，正如發達國家的“前車之鑒”所提示的那樣，如果發展中轉軌國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類問題，依然會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出現財富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怎麼辦？發達國家和經濟學都沒有答案。這正應對了 2003 年約翰·米爾斯認真地表達的一個觀點，經濟學還“沒有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從未作出過回答”。⁶⁹ 當然，新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學派對此有著完全不同的回答：財富和收入分配方面出現的問題要依靠進一步地私有化、市場化來解決。費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一書中就充分地表達了這一邏輯。⁷⁰ 但是，面對現實，極右翼的構想祇是一張無法兌現的支票。

⁶⁷ 〈德國技術合作公司總裁：中國不能祇有富豪和窮人〉，《中國青年報》2005 年 12 月 29 日。2006 年 3 月 31 日《中國青年報》：“聯合國預測中國 GDP 增長 8.4%，貧富差距亟待解決”。〈聯合國駐華機構代表：貧富差距將是中國最大挑戰〉，《中華工商時報》2006 年 4 月 11 日。

⁶⁸ 〈世行：中國貧富差距加大，窮人更加貧窮〉，中國金融網 2006 年 11 月 22 日。

⁶⁹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第 5 頁。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⁷⁰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第 272、275~300 頁。並參見朱彤書

另外，目前一個非常現實的約束條件是，在全球人口快速增長、不公正的資源分配格局、脆弱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有限的技術條件下，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中，是否允許眾多的發展中轉軌國家的財富增長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從而能夠實現它們那樣的工資和福利制度，這是一個不能得到論證的問題。

更何況，發達國家的工資和福利制度正面臨著種種問題，其持續性受到拷問。所謂的“放鬆勞動力市場管制”和“社會保障私有化”引發的社會抗議風潮和理論界的尖銳批評，就是當下的典型案例。

這些反思意味著，發展中轉軌國家需要探索自己的特殊道路，在實踐中創造自己的特色理論。

2、對中國而言，由於歷史傳統和改革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特別地注意“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運行會在社會公平方面帶來一系列消極後果。”當然，“這種消極後果的嚴重程度是與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關聯的”，加強公共治理是非常正確的、重要的政策選擇之一。⁷¹ 但是，發達國家“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的政策能否提供治本的藥方，這劑藥的“化學成份是否穩定”，是缺乏事實支持和在理論上存在嚴重疑問的。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開出的代議制＋市場經濟（＋私有化）的藥方，⁷² 沒有能夠治住歐、美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的宿疾新傷，更沒有必要指望它可以解決中國的複雜問題。

（二）要依據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新鮮經驗，認真評估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會在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方面帶來的一系列消極後果

主編：《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第 456~460 頁。

⁷¹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第 23 輯，第 80 頁。

⁷² 參閱趙曉在〈盛世危言：縮小收入差距難度高過振興經濟〉中介紹的陳志武的文章，《上海證券報》2006 年 11 月 2 日。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承認這個現象）。對策是，一方面要以中國的環境、實踐和理論為基礎，以“為人民服務”為導向，對各類型國家的正、反經驗進行綜合分析，在反復比較中吸取營養，探索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新方向。要採取靈活的發展政策，增強經濟實力，不斷地適時完善公共治理，增強公共服務。政府既要彌補“市場失靈”，又要設定機制防止“政府失靈”。另外，在所有制政策方面，根本性的對策還是要保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憲法制度。既發展私權，又抑制私權過分膨脹。⁷³ 要在憲法的框架內不斷完善政治體制和公民社會機制。

不用多說，市場機制在實現社會公平等方面存在“失靈”，政府作用也不是盡善盡美。創建兩者相互補充的機制是必要的選擇。一個社會要比較穩定的正常運行，需要市場、政府和社會之間形成比較理想的良性互動。

需要再分析一下的是私權和收入分配的關係。按照西方的傳統經濟學理論，市場以私權為基礎。但是，對大量私權缺乏效率的現象，新古典經濟學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論證。20世紀70年代日漸展開的全球性的私有化運動，就是企圖在公共政策中徹底清除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以進一步擴大市場、私權的範圍來解決傳統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包括社會公平問題。但是，如前所述，事實不盡如人意，自欺欺人、南轅北轍、禍國殃民的現象此起彼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是在馬克思之後的一百多年，一些西方學者通過對私有化運動的實證分析再次發現，在發達國家，在進一步擴張私權和市場的作用後，社會公平問題和原有的工資和福利

⁷³ 孫中山先生早年考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後，就針對中國國情提出了“節制資本”的主張。他明確指出：“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20頁。

制度的可持續性又遭遇了嚴重的挑戰。而對外貿易和勞動力市場是萬萬不能徹底開放的。

在發展中的轉軌國家，私權表現的作用更為複雜：在一定條件下，私人企業比缺乏競爭、管理無方和腐敗官員治理下的公有制企業有效率；但在大量買賣國企和建立了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中，發生了收入分配狀況惡化，不能實現具有可持續性和公平性的經濟增長的問題。一些拉美國家還出現了增長中斷的極端現象。而過度的貧困現象也在破壞私權的委託~代理關係的有效性，並使得建立市場秩序的努力常常落空，社會動蕩不安。

另外，目前為止，在中國，無論是在壟斷行業還是在競爭性行業，一批國有企業在改革中已經提高了效率、效益和在國內外的競爭力（在歐盟和其它一些國家也有這種事），並且表現出有希望的發展前景，——這就更加映照出私有化的弊病和局限，使私有化造成的財富集中對收入分配造成的負面影響表現得格外刺眼。這裡簡約地介紹一些有關理論。

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理論。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中寫道，“財產與勞動相分離是資本和勞動進行交換的必要規律”。⁷⁴ 這種分離就是財產在資本家的手中集中，是工人的“絕對貧困”。“工人的絕對貧困……無非是說，勞動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夠出售的商品，工人祇是作為勞動能力與物質的、實際的財富相對立。”⁷⁵ 在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中，資本天然會為了利潤最大化而利用自身的優勢和工人之間的競爭，拼命壓低工資和勞動條件。在工人進入生產過程後，有了工資，是脫貧（指脫離了“絕對貧困”）了，但在通過工資形式參與社會總產品分配時，祇得到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的相對部分，這部分價值與為資本家提供

⁷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93頁。

⁷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9頁。

的價值的比例關係，形成了工人的“相對貧困”。資本主義生產是“以剩餘價值為目的即以生產者群眾的相對貧困為基礎的”。⁷⁶ 這種“相對貧困”通過工人的相對工資（或稱為“比例工資”）表現出來，反映了“產品的價值在他（指工人——引者註）與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的比例”。⁷⁷ 當然，馬克思非常聰明地指出過，從社會總財富的分配比例來看，工人所得不會絕對地減少，祇是相對地減少。隨著生產率提高等因素的影響，工人的工資會提高。馬克思很注意這種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比例關係。他認為，“階級和階級相互之間的狀況，與其說決定於工資的絕對量，不如說更多地決定於比例工資”。⁷⁸ 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由於同物的財富分離而處於絕對貧困，因此他必須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出售成功後，他在參與分配時又陷入相對貧困。這種相對貧困並不排除，在一定條件下工人的工資會提高，以及在另外一種條件下工人的工資會下降。階級關係狀況取決於財富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配比例。工人分散的自發鬥爭和工會有組織的鬥爭，可以改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關係，增加工人所得份額。但是，工人要徹底出離這兩種貧困狀況，祇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才能實現。⁷⁹

現代西方學者對於私權的認識和反思。現代西方經濟學，包括主流學派並不否認私權是“不平等的原因”。新古典綜合派的大師薩繆爾森就說過，“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第一位的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

⁷⁶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135頁。

⁷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607頁。

⁷⁸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卷，第477頁。

⁷⁹ 夏小林：〈馬克思的工人“絕對貧困”觀和工人“相對貧困”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未定稿》1980年28期。

能力，教育、訓練和機會，年齡和健康。在資本經濟體內解決收入差別的基本政策方向是，建立現代福利制度和混合經濟。但帕累托遵循古典經濟學的理论認為，“人們對於不平等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強大到國家干預所不能影響的地步”。薩繆爾森則以為，福利制度和混合經濟的出現，或者還應該加上“普選權”對於強勢集團的制約作用，已經解決了嚴重的不平等可能引發社會革命的問題。但是，不平等本身依然存在。⁸⁰ 不過，哈耶克、費里德曼一直反對福利國家的政策選擇。⁸¹

20世紀70年代逐步展開的私有化運動，已經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這引發了西方學術界對私權和不平等關係，以及不平等對經濟增長負面影響的嚴重性進行再探索。這些年來，在西方的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已經有一批學者先後提出，“資產不平等對消費增長具有非常有害的影響”。同樣，“收入的初始不平等對未來的增長速度具有十分消極的、統計上十分重要的影響”。⁸² 有的學者甚至發現，“最初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造成的影響能夠永遠持續下去，並且長久地限制增長”。⁸³ 不平等還會帶來各種社會危機。

私有化導致的財富集中和兩極分化，會削弱工人的談判能力，在“強資弱勞”的不對稱關係中形成低工資，並摧毀窮人“向上流動”的社會機制。多年來非常關注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卡拉·霍夫和前副行長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曾經寫道，“如果許多人根本沒有資產或者資產很少，那麼

⁸⁰ 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第40章。

⁸¹ 朱彤書主編：《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第343~358、456~460頁。

⁸² 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39頁。

⁸³ 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第281頁。

工資率將會很低。因為低工資，最初財富很少的人就會給下一代留下很少的遺產。這樣，最初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可能從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自我複製”。⁸⁴

私權能夠對收入分配、社會穩定和可持續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的觀點，在中國也不乏事實的支持。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 2005》中，數據顯示：

改革開放以後，財產的集聚和集中成爲一種必然的趨勢。在總財產中，最富有的 20% 的人擁有 59% 的財產，而財產最少的 20% 的人口則有不足 3% 的財產。2002 年全國總財產分佈差距的基尼係數就已經達到了 0.55。這種差距與收入差距的擴大（基尼係數達到 0.45）交織在一起，對社會產生了很強的衝擊力。⁸⁵

既然如此，在完善公共治理，增強公共服務的改革中，確實需要直面私人財產快速、高度集中對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產生的嚴重影響，——這也屬於公共治理視野之內的事。

可能，正是由於發達的私權和不平等是傳統市場經濟的常態，是“被默認的正常值”，所以，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分析框架中，這就成爲了不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例如，現在世界銀行談論的平等重在兩個含義，即要保證“機會均等”和避免在“結果均等”方面出現“絕對貧困”，⁸⁶——這等於說，要避免因“絕對貧困”而引發針對富人和政府的社會革命。而“相對貧困”問題在其分析框架中就相對淡化了，——但是，這也比極端的自由放任主張“仁慈”一點。

⁸⁴ 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第 281 頁。

⁸⁵ 聯合國 UNDP：《中國人類發展報告：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第 27~32 頁。

⁸⁶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第 23 輯，第 75 頁。並見 2006 年世界銀行報告《公平與發展》，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2 月，第 2 頁。

當然，關於私權和不平等的各種複雜關係可以繼續去談論，但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不同學派、學科的角度看，私權是不平等首位原因的事實和邏輯的存在，畢竟在提示人們，反思我國日益嚴重的不公平問題的成因時，在“本質上”排除“私人產權”和市場的重要的負面影響，僅僅是批評政府“公共治理”和市場化的改革“嚴重滯後”是非常片面的，不利於全面地認識問題和制定有效的對策。

特別是，對於數億雇員而言，改進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和現狀，規範市場秩序，是可以在有限範圍內改善就業質量和收入分配狀況，但是，綜合近 30 年左右的國際經驗，特別是在中國十分缺乏公民社會機制對強勢利益集團的制衡和腐敗比較嚴重的條件下，長期地看，具有很多放任因素的勞動力市場，配合以私權為核心的非國有部門在就業領域持續的巨大擴展，將促進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現象進一步發展，將使越來越多的沒有資產的人成為其雇員。如是，中國的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狀況（包括馬克思說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確實將如美、英等國一樣，繼續下行。所以，就是在世界銀行專家的分析中，政府公共治理的內容，也包含了政府要適當干預勞動力市場的政策性選擇。⁸⁷

另外，全球化中私權主導的“尋底競爭”不僅在一再抑制工會作用和雇員工資的增長，而且在抑制和開始瓦解政府的公共服務，包括現行的社會保障體制，破壞“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這也是我們需要警惕和防範的一種政治和社會風險。⁸⁸

綜上所述，就是要正確地把握和處理影響收入分配的各種複雜因素之間的關係。

⁸⁷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第 23 輯，第 77 頁。並見世界銀行《公平與發展》第 9 章。

⁸⁸ 魏伯樂、奧蘭·揚等：《羅馬俱樂部報告：私有化的局限》第二、三部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包括“基本經濟制度”）需要保持，——但不是“資改”。

公共服務需要在改革中加強，爭取建立能夠長期實現“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的政策機制，——而不是連社會保障制度和其它合理的社會福利也要逐漸私有化（這是布什政府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一）。

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需要大力發展，以改善國家治理結構，發展社會和諧，——但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腐敗和壟斷行為是需要治理，——但“反腐敗”不是製造“小政府”和促使政府從經濟領域全面退出，以及把國企徹底私有化的藉口；治理壟斷行為不是要把壟斷型國企變壟斷型“私企”和“外企”，或在虎視眈眈、碩大無朋的跨國公司面前把相對小的國有大企業肆意分割，剝成肉末，讓民族工業的精英“揮刀自宮”。

勞資關係協調機制需要抓緊建設和加快創新的步法，——但不能就事論事，迴避它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密切關係，迴避私權、市場、全球化能夠對它和收入分配帶來的負面影響問題，從而非理性地重複哈耶克 / 撒切爾政治聯盟的致命錯誤。

總之，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是和諧，是強國，不是“打左燈往右拐”。

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會促進收入分配不公狀況的發展。這種現象並不否認，在一定條件下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會促進總體財富的增長，窮人的狀況有所改變。⁸⁹ 這是資本和市場的兩面

⁸⁹ 例如，馬克思曾經寫道，“不應當因為在某個國家中勞動的相對價值隨該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下降，就認為在不同國家中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情況恰恰相反。在世界市場上一個國家同其它國家相比，生產率越高，它的工資也就越高。在英國不僅名義工資比大陸高，實際工資也比大陸高。工人吃較多的肉，滿足較多的需要”（馬克思著《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第5頁）。

性。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其它西方理論中都可以找到的一種共識。但是，在馬克思的眼中，這種財富增長方式對多數人所帶來的是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交織出現，儘管他們中部分人的狀況縱著比會有所改善，但也離不開相對貧困的陷阱。⁹⁰ 現代福利國家的出現，進一步增加了窮人在社會總財富中分配的份額，也沒有消除這種相對貧困的存在。更何況，資本全球化導致的“尋底競爭”，已經在侵蝕和瓦解這種福利制度。現在，由於對人口增長、地球資源有限性和環境脆弱性認識的深化，人們看到了全球化帶來的增長實際上是少數富國在進行“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先富帶後富，全球共同富”祇是一個夢。“夢已經醒來”，該尋找新長征的路徑了。

（三）中國的日程表：用 5~10 年間先後基本解決增強公共服務和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兩大問題。

在國內，積極解決過於滯後的公共治理領域的改革問題，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是絕對必要的。涉及二次分配的看病、教育、住房類問題需要投入大量財政資金並進行新的制度安排，其日程可能不太長，2~5 年內可以初見成效。

但是，在初次分配領域中，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主要依靠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投入，修改和補充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各方當事人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其日程要比較長一些。參照美國在 20 世紀 30 年代建立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經驗，估計要 5~10 年時間。爭取在前五年內基本完成《勞動法》的修改和形成比較完整的配套法律法規，彌補制度欠缺。在整個十年內，精心策劃完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總體戰略方案、各項戰役方案和戰術性

⁹⁰ 馬克思寫道，當我們從社會總基金的分配比例關係來計算工人所得部分時，“不應得出結論說，工人從中取得收入的基金會絕對地減少。這種基金同他們所生產的總產品相比，祇是相對地減少”（馬克思著《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第 645 頁）。

舉措，認真安排具體進展的日程，進行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進，直至覆蓋全國。如果中國在改善雇員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比如，扭轉了在職職工都成為了貧困主體的荒唐局面，扭轉了農民工低收入、無社會保障的局面，雇員的合法勞動權益能夠得到充分保障，生活水平提高，這也可以支持二次分配領域內的改革繼續深化，增加財政政策的靈活性，進一步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於國於民兩利。

在這方面，建議中央和國務院要進一步制定政策，安排領導同志專人負責，大力強化“國家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會議”（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企聯／企協組成）的功能，進一步發揮它在“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發展和諧勞動關係”方面的組織策劃、統籌協調、逐步推進、監督實施等作用。糾正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組織的異常狀況。

完成以上日程，基本的保障條件是中國保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加大改進政府治理結構和反腐敗的力度，國企改革不斷取得成功，保持黨和政府對最廣大民衆的動員能力，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項出了問題，都構成衝擊日程的風險。

最後，綜合馬克思和其他西方學者對於市場、私權負面作用的批評，設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要堅持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要直面市場經濟的複雜性和“弱肉強食”的基本趨向，充分認識到政府作用的意義，充分認識到改革中的國企已經在發展的意義。不要真當了“哈耶克的好學生，而歐洲不是”，美國也不全是。